

## 唐僖宗光启三年避难汉中返京行程考

王使臻, 张建勇, 苗玉栋

(陕西理工学院 秦岭与蜀道文化研究所, 陕西 汉中 723000)

**[摘要]** 通过对英藏敦煌文献《唐光启三年沙州进奏院上归义军节度使状》的深入挖掘,对光启三年避难于汉中的唐僖宗銮驾返回关中地区的交通路线、驿站及其行程进行了考证。

**[关键词]** 敦煌文献; 公文; 唐僖宗

**[中图分类号]** K24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936(2014)01-0024-03

敦煌藏经洞所出文献十分丰富,其中许多文献记录了晚唐五代宋初时期关中、陕南、四川地区的历史事件、社会生活风俗。英藏敦煌文献 S. 1156《唐光启三年(887)沙州进奏院上归义军节度使状》就是其中的一件,记录了唐代末年敦煌归义军六十余人使团从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前往凤翔府(今宝鸡凤翔)所用的行程时间。从中既可以推断当时所行走的汉中通往关中地区的驿路情况,也可以据之以考证出光启三年避难于汉中的唐僖宗行在朝廷究竟是沿着哪一条通往关中地区的交通路线返回关中的,是与唐宋时期秦岭蜀道研究相关的一条重要的新材料。

### 一、敦煌文献中记录的汉中往凤翔的行程

这件珍贵的唐代历史文献,其价值和意义尚未被唐史研究学者们充分地发掘。现录其主要部分如下:

进奏院状上。

当道三般专使,所论旌节次第(第)逐件具录如后。右伏自光启三年二月十七日专使押衙宋闰盈、高再盛、张文彻等三般同到兴元驾前。十八日使进奉,十九日对,廿日参见四宰相、两军容及长官,兼送状启信物。其日面见军容、长官、宰相之时,张文彻、高再盛、史文信、宋闰盈、李伯盈同行,□定,宋闰盈出班,祇对叩击。具说本使一门拓边效顺,训袭(习)义兵,朝朝战敌,为国输忠,请准旧例建节。廿余年,朝廷不以指搆(挥),今固遣闰盈等三般六十余人论节来者,如此件不□(赐)获,绝商量,即恐边塞难安,专使实无归路。军容、宰相处分:“缘驾迴(回)日近,专使但先发于凤翔祇候,待銮驾到,即与指搆(挥)者。”至廿二日,夷则以<sup>①</sup>专使同行发来。三月一日却到凤翔。四日驾入。五日遇寒食,至八日假开,遣参宰相、长官、军容。……<sup>[1]</sup>

**[收稿日期]** 2013-12-10

**[作者简介]** 王使臻(1976-),男,甘肃永登人,陕西理工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师,中国史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唐宋地方史、汉水流域历史文化。张建勇,男,陕西理工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历史学本科生。苗玉栋,男,甘肃省兰州市永登县南峰中学教师。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出土唐五代公文整理研究”(项目编号:13XZS005);陕西理工学院校级科研基金项目“车驾播越在兴元——唐政府流亡汉中期间的政务运作研究”(项目编号:SLGQD13-36)阶段性成果。

<sup>①</sup>“以”字当作“与”。在唐代河西地区方音中,以通与。参:郝春文等主编《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五卷,2011年,第154页。

从上录唐代末年的上报公文可知,光启三年(887)二月十七日敦煌归义军使者到达山南西道节度使治所兴元府,在兴元府停留三天,二十日参观了当时因避乱而暂驻于汉中的唐行在朝廷的头面人物政事堂四宰相,及握有军事实权的监管唐中央政府禁军神策军的宦官首领。由于光启二年末,邠州节度使朱玫之乱已经被其部将王行瑜联合其它藩镇势力所平定,唐行在朝廷正要准备迁回京师长安,结束因光启二年朱玫之乱造成的国家政局混乱的局面,使得唐政府没有时间来处理与地方藩镇敦煌归义军相关的政务。敦煌归义军使团又停留二天后,于二月二十二日便从汉中启程,前往关中,使团于三月一日到凤翔府(宝鸡),整整用去了9天时间(二月是小月,只有29天)。据此行进的时间估计,唐政府行在朝廷的各级机构的前行速度显然也差不多(虽然唐行在朝廷从汉中出发的时间显然要比敦煌归义军使团要晚,到达宝鸡凤翔的时间也比归义军使团晚3天,三月四日銮驾进入凤翔,与史书所记录的时间相吻合),由此推断,不论是政府机构,还是负有重要使命的使团,或是普通的商旅平民,从汉中出发往凤翔,经褒斜栈道翻越秦岭的路途平均需要9至10天的时间。由于前述敦煌公文中所记载的晚唐汉中到凤翔的交通道路过于简略,现结合历史文献、前人研究成果等,进一步进行解读与挖掘。

## 二、敦煌归义军使团和唐行在朝廷返回凤翔的路线

前述敦煌文献中虽然没有记载当时使团所行走的道路情况,但唐宋时期从汉中前往长安的路线,据历史文献记载主要是走褒斜道。但无论是唐宋史书中,还是地理方志书中所记录的“褒斜道”(或称斜谷道),与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汉魏褒斜道有很大的区别,经常使人产生误会或误解。经过著名的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的考辨,“唐代所谓褒斜道绝大多数指褒城(今陕西汉中褒河)至凤州(今陕西凤县)道而言”,只是借用了汉魏褒斜道的名称罢了<sup>①</sup>。他引用唐宋人丰富的历史文献、诗词歌赋等资料,考证唐中叶以后史籍志书所见之“褒斜道”、“斜谷道”之名,“多数指散关至褒城道,即北魏所开通之回车道,汉魏古褒斜道反而不著矣”<sup>[2]</sup>。他以详实的历史文献雄辩地证明,盛唐以下,散关—褒城道几乎专用“褒斜道”、“斜谷道”之名,为秦梁之间交通之重要干线。而先秦汉魏时期眉县—褒谷之间的古褒斜道,已经不再是主要的交通大道了。汉魏古褒斜道,在唐宋时期则基本上废弃不通,即使偶而修治之(唐宝历二年、唐大中三年都曾重修),但也很快便因为路途险峻、不便于行人、山洪冲毁等原因而废弃了。

唐宋时期从汉中前往长安的主要路线褒斜道,已不是汉魏古褒斜道,那么,光启三年敦煌归义军使团与唐朝行在朝廷从兴元前往凤翔的道路会不会是史籍中所记载的“兴元新路”或“文川道”呢?略作考辨后,便知不可能。所谓唐“兴元新路”实质是汉魏古褒斜道的一条支路,其南端不走险碍的褒谷口而出城固文川<sup>[3]</sup>,其中段与北段,其实仍然是汉魏古褒斜道。从唐人孙樵所作的《兴元新路记》<sup>②</sup>中对沿途所经驿站与道路情况的详细描述中,可知自青松驿以下新修的驿路和驿站正是所谓的“兴元新路”,或称文川道,据《唐会要·道路》记载,在新路修好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一则道路很不方便来往行人行走,加之山洪摧毁栈道,这条新路竟然面临着“使命停拥,馆驿萧条”的废弃状态<sup>[4]卷86</sup>,唐廷下令重修斜谷旧路及其馆驿,实际上新路被废弃。在兴元新路被废弃,朝廷重修褒斜旧路的情形下,新任的山南西道节度使封敖,动用兵士与民夫,以两个月不到的时间(唐廷于六月下令修置驿站,七月二十二日,封敖向唐廷报告山南西道境内的斜谷旧路已经修通),被山洪摧毁的道路、破败的馆驿已经修好并重建,普通的商旅骡马担驮往来通过全无障碍,所修好的“斜谷旧路”完全可以接待南北往来的朝廷使人、政府官员,以传递使命。虽然封敖上给唐廷的奏章中不曾提及所修好的道路及驿站名称,但根据其在不到两

①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三卷,《秦岭仇池区》,篇十九:汉唐褒斜驿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三,台北:1985年,第701页。严先生还分析了唐人所称之“褒斜道”名实不相符的原因。他援引《石门颂》、《华阳国志》、《三国志》等历史文献证明,汉魏时人,既将褒谷也称斜谷,《石门颂》“诏书开斜”、《华阳国志》“玺书交驰于斜谷之南”),也将褒斜道专称为“斜谷道”,沿袭到唐世,则也用“斜谷”之模糊称谓去称呼“褒谷”(《元和郡县志》“兴元府褒城县条”称其“当斜谷大路”是其明证也)。同时,最为关键的是,即使是散关—凤州—褒城道(所谓唐宋褒斜道)的南段,由于其与汉魏古褒斜道之南段完全相同,因此也含糊地称之为“斜谷道”或者“褒斜道”。

②记文参考(清)罗秀书等原著、郭鹏校注《〈褒谷古迹辑略〉校注》,《唐孙樵兴元新路记略》,第76页。

个月的时间内就能修通斜谷路的高效率判断,当然是在原有道路、驿站基础上进行的重建与改造,大概就是学者所言“系指北魏永平二年改道之后的褒斜道”的一部分,史籍中虽然也称之为斜谷道,但根本就不是汉魏褒斜古道,而是经褒城前往凤州的道路。

### 三、敦煌归义军使团和唐行在朝廷返回凤翔路途所经过的地名与驿站

可惜前述唐代公文中未能详细记录经褒斜栈道翻越秦岭到达宝鸡的具体行程,以及其间的驿站、驿路情况,但根据唐宋时期有关汉中地区栈道、驿路的交通记录,推想在当时,沿路仍然存在由唐地方政府控制并提供基本服务的驿站系统存在,这些驿站也基本完整,发挥了正常的供给食宿、传递政令消息的功能,并没有因为战乱而毁坏不能通行或者被废弃的情况。严耕望先生在《唐代交通图考》中认为,唐代褒斜道呈“Y”字形,南段是汉魏古褒斜道之南段,北段分东西二支,东支沿汉魏褒斜古道东北而达眉县;西支沿北魏回车新开道而西北达凤县。分支点,即在武休关(武关驿)附近。然而东支路线,塞时多,通时少,不甚重要,不是当时的主要交通干线。西支其实是唐代交通之干线。如果从兴元府西北出发前往凤翔府,沿褒斜栈道,其行程所经地名及驿站主要有:褒城驿(唐时即有天下第一驿之称)、石门、鸡头关、七盘岭、右界驿(坂下馆)、武兴驿(骆驼荐馆)、甘亭关、悬泉驿(甘亭馆)、武休潭(宋置武休驿)、斜谷关、白涧、回车戍、凤州(梁泉县),里程计三百五十里左右,大概置有十驿。即唐宋“褒斜栈道”内设置有十座驿站,与唐诗人薛能《褒斜道中》诗“十驿褒斜到处慵,眼前常似接灵踪”及唐刘禹锡《山南西道新修驿路记》“自散关抵褒城次舍十有五(驿)”所记载的情况是十分符合的<sup>①</sup>,以唐人唐诗证唐史,唐人所谓褒斜道,即是指自散关经凤州抵达褒城的驿道。

### 四、敦煌归义军使团和唐行在朝廷返回凤翔的具体里程

据唐人《元和郡县志》和宋代《太平寰宇记》所记载的唐宋时期的驿路里程,兴元府至凤州梁泉县380里(公元800年成书的《通典》中记载兴元府至凤州395里驿路,与之大体相同),兴元府至褒城驿30里,回车至凤州梁泉县60里,则褒城至回车之间的褒斜栈道的里程约是290里,可能是行程中最为艰险、最为辛苦的一段路程。据《元和郡县志》,散关东北至宝鸡县52里,宝鸡县东北至凤翔府90里,则散关至凤翔府的里程是142里;据唐宋方志记载凤州东北至凤翔府280里,则凤州至大散关约138里,散关约在凤州和凤翔府大路的中点上。因此,兴元府—褒城(30里)—回车戍(290里)—凤州(60里)—散关(138里)—凤翔府(142里)之间的总里程是660里,其中最为艰险的“褒斜栈道”的里程是290里,约占兴元府至凤翔府总里程的44%,约占去了一半的里程。唐宋时期使团的一般行程,大约是每日两驿<sup>②</sup>约六十里左右。则自兴元府到凤翔府,行走在当时主要的交通大路(褒城—回车—凤州—散关—凤翔),约计660里。以每日两驿60里计算,理论上大约需要11日。理论上计算出来的里程数与前述敦煌文献中所记录的归义军使人到达凤翔实际上的行程(9日),基本上是符合的,可证当时敦煌归义军使团和唐行在朝廷所通行的道路,所谓的“褒斜道”或“斜谷道”,就是此路无疑。

### 五、结 论

《旧唐书·僖宗纪》记载光启三年三月甲申日“车驾还京,次凤翔”,当是指唐僖宗銮驾从兴元府出发回还京师长安的时间,其实是在二月“甲申日”;《资治通鉴》卷256“光启三年”条记载“(三月)壬辰(日)车驾至凤翔”,则是僖宗车驾到达凤翔府的具体时间在三月“壬辰日”,从“甲申日”到“壬辰日”,共

(下转第32页)

<sup>①</sup>据唐宋方志地理文献所记载凤州至大散关约140里,以30里置一驿的常规来推断,凤州与散关之间当设置有四驿到五驿之间,则唐代褒斜栈道内设有十驿,正与薛能诗相合。

<sup>②</sup>唐宋元时期对官员赴任、信使行程时间都有较为详细而严格的规定,除紧急情况之外,乘马者日行70里,乘车者日行40里,乘驿者每日两驿行程(60里左右),乘舟者逆水日行80里,顺水日行120里。参考《元史》卷83《选举志》“赴任程限”条。宋元时期的驿程继承自唐,因此,推测唐代亦是如此。

意义。蜀道抒怀诗词中的那种拯救与逍遥构成的张力,使我们更加体会到,蜀道因其独特山川和历史遗存,可以为不同的人提供精神家园的载体,才为一次又一次人所迷恋!

### [ 参 考 文 献 ]

- [1]郭荣章.石门摩崖石刻研究[M].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26.
- [2]M. H. 阿伯拉姆.简明外国文学词典[M].曾忠禄,郑子红,邓建标,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367.
- [3]严如煜.汉中府志卷三十一“拾遗”[M].清嘉庆十八年续修,1925年重刻本.
- [4]刘勰.文心雕龙[M].龙必琨,译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95,101.
- [5]马强.蜀道文化述论[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4).
- [6]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M].瞿铁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38.
- [7]罗联添.李白《蜀道难》寓意探讨[M]//唐代文学学会.唐代文学研究第五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 [8]刘刚.《蜀道难》的文学地理学解读[J].社会科学辑刊,1993(6):148-150.
- [9]孙启祥.《泥功山》属秦州纪行诗吗?[M]//孙启祥.汉中历史文化论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337.
- [10]李焘.尚书故实[M]//宝颜唐秘笈.文明书局,民国十一年出版.
- [11]晁说之.题杨如晦二画[M]//四部丛刊续编本《嵩山文集》卷四.
- [12]范成大.清湘驿送祝贺州南归[M]//范石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13]方孝孺.蜀道易有序[M]//四部丛刊本《逊志斋集》卷二十四.
- [14]马强.唐代诗人汉中市地诗考略[M]//马强.汉水上游与蜀道历史地理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99-120.
- [15]马强.论唐宋蜀道诗的文化史意义[M]//马强.汉水上游与蜀道历史地理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267-268.
- [16]王利民,查紫阳.秦蜀驿道上的神韵与性灵[J].中国韵文学刊,2003(1):33-40.

[责任编辑:朱飞]

(上接第26页)

计9天时间。传世书记载的从兴元府到凤翔府的行程(9天)与出土的敦煌文献中记录的归义军使团所花费的时间(9天)完全是符合的。唐僖宗行在朝廷到达凤翔府后,由于京师长安宫殿被战乱焚毁,修葺未完成,只得暂时停留在凤翔。唐僖宗銮驾返程终点到达凤翔府,但唐宋史书未明确记录所走为哪条道路。严耕望先生通过考察唐三帝(玄宗、德宗、僖宗)四次南幸兴元,往返八程道路,“除去德宗去程及僖宗第一次去程取骆谷道之外,其余六次皆取散关道,无一取(汉魏)褒斜古道者”。如果严先生据此去说明僖宗两次归程,“虽不知取褒城—凤州道,或者取兴州—凤州道,但可以肯定,绝不是取眉褒间汉魏之褒斜古道可知也”的结论仅仅是推测,而缺乏历史实际证据的话,那么,前述敦煌文献中明确记载的归义军使团从兴元府到达凤翔府所用去的时间(约9天),不仅与唐宋时期兴元府至凤翔府之间“褒斜道”的里程数之间高度契合,而且也与传世的唐宋史籍中明确记载的唐僖宗车驾从兴元府到达凤翔府所用去的时间(约9天)完全一致的情况,已可以证实严耕望先生的推断是正确的,也就能够补正史记载的缺漏与不足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契合,证明了光启三年唐僖宗銮驾回京的路线是沿着“兴元府—褒城—回车戍—凤州—散关—凤翔府”这条晚唐时期沟通关中与汉中的主要的交通干线。这正是敦煌文献中写于唐光启三年的公文的无比珍贵的历史价值之所在。

### [ 参 考 文 献 ]

- [1]四川人民出版社等(编).英藏敦煌文献[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241.
- [2]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三,1985:728,729,732.
- [3]郭荣章(编著).石门石刻大全[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1:126,128.
- [4]王溥.唐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88.

[责任编辑:朱飞]